

陳平原 主編

三聯人文書系

趙園 著

明清之際的思想與言說



總序

陳平原

老北大有門課程，專教「學術文」。在設計者心目中，同屬文章，可以是天馬行空的「文藝文」，也可以是步步為營的「學術文」，各有其規矩，也各有其韻味。所有的「滿腹經綸」，一旦落在紙上，就可能或已經是「另一種文章」了。記得章學誠說過：「夫史所載者，事也；事必藉文而傳，故良史莫不工文。」我略加發揮：不僅「良史」，所有治人文學的，大概都應該工於文。

我想像中的人文學，必須是學問中有「人」——喜怒哀樂，感慨情懷，以及特定時刻的個人心境等，都制約着我們對課題的選擇以及研究的推進；另外，學問中還要有「文」——起碼是努力超越世人所理解的「學問」與「文章」之間的巨大鴻溝。胡適曾提及清人崔述讀書從韓柳文入手，最後成為一代學者；而歷史學家錢穆，早年也花了很大功夫學習韓愈文章。有此「童子功」的學者，對歷史資料的解讀會別有會心，更不要說對自己文章的刻意經營了。當然，學問千差萬別，文章更是無一定之規，今人著述，盡可別立新宗，不見

得非追韓摹柳不可。

錢穆曾提醒學生余英時：「鄙意論學文字極宜着意修飾。」我相信，此乃老一輩學者的共同追求。不僅思慮「說什麼」，還在斟酌「怎麼說」，故其著書立說，「學問」之外，還有「文章」。當然，這裡所說的「文章」，並非滿紙「落霞秋水」，而是追求佈局合理、筆墨簡潔，論證嚴密；行有餘力，方才不動聲色地來點「高難度動作表演」。

與當今中國學界之極力推崇「專著」不同，我欣賞精彩的單篇論文；就連自家買書，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專題文集，而不是疊床架屋的高頭講章。前年撰一《懷念「小書」》的短文，提及「現在的學術書，之所以越寫越厚，有的是專業論述的需要，但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缺乏必要的剪裁，以眾多陳陳相因的史料或套語來充數」。外行人以為，書寫得那麼厚，必定是下了很大功夫。其實，有時並非功夫深，而是不夠自信，不敢單刀赴會，什麼都來一點，以示全面；如此不分青紅皂白，眉毛鬍子一把抓，才把書弄得那麼臃腫。只是風氣已然形成，身為專家學者，沒有四五十萬字，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。

類似的抱怨，我在好多場合及文章中提及，也招來一些掌聲或譏諷。那天港島聚會，跟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陳翠玲偶然談起，沒想到她當場拍板，要求我「坐而言，起而行」，替他們主編一套「小而可貴」的叢書。為何對方反應如此神速？原來香港三聯向有

出版大師、名家「小作」的傳統，他們現正想為書店創立六十週年再籌畫一套此類叢書，而我竟自己撞到槍口上來了。

記得周作人的《中國新文學的源流》一九三二年出版，也就五萬字左右，錢鍾書對周書有所批評，但還是承認：「這是一本小而可貴的書，正如一切的好書一樣，它不僅給讀者以有系統的事實，而且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想。」稱周書「有系統」，實在有點勉強；但要說引起「許多反想」，那倒是真的——時至今日，此書還在被人閱讀、批評、引證。像這樣「小而可貴」、「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想」的書，現在越來越少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嘗試一下？

早年醉心散文，後以民間文學研究著稱的鍾敬文，晚年有一妙語：「我從十二三歲起就亂寫文章，今年快百歲了，寫了一輩子，到現在你問我有幾篇可以算作論文，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，可能就三篇吧。」如此自嘲，是在提醒那些在「量化指標」驅趕下拚命趕工的現代學者，悠着點，慢工方能出細活。我則從另一個角度解讀：或許，對於一個成熟的學者來說，三五篇代表性論文，確能體現其學術上的志趣與風貌；而對於讀者來說，經由十萬字左右的文章，進入某一專業課題，看高手如何「翻雲覆雨」，也是一種樂趣。

與其興師動眾，組一個龐大的編委會，經由一番認真的提名與票選，得到一張左右支

拙的「英雄譜」，還不如老老實實承認，這既非學術史，也不是排行榜，只是一個興趣廣泛的讀書人，以他的眼光、趣味與人脈，勾勒出來的「當代中國人文學」的某一側影。若天遂人願，舊雨新知不斷加盟，衣食父母繼續捧場，叢書能延續較長一段時間，我相信，這一「圖景」會日漸完善的。

最後，有三點技術性的說明：第一，作者不限東西南北，只求以漢語寫作；第二，學科不論古今中外，目前僅限於人文學；第三，不敢有年齡歧視，但以中年為主——考慮到中國大陸的歷史原因，選擇改革開放後進入大學或研究院者。這三點，也是為了配合出版機構的宏願。

二〇〇八年五月二日

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

目錄

序	001
說「戾氣」	005
時間中的遺民現象	043
談兵	085
我讀傅山	179
附錄	209
《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》後記（節錄）	210
《制度・言論・心態——〈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〉續編》後記（節錄）	221
徵引書目	227
作者簡介	234
著述年表	235

序

本書諸篇，分別取自我的《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》及其續編，經了校訂與個別處的刪改——尤其對於煩瑣累贅的註釋。但《我讀傅山》一篇的註釋基本保留，因那些註釋是正文的補充、甚至延伸。兩篇後記的節錄，或許有助於對所選篇目的瞭解。我的從事這項研究，始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，迄今已近二十個年頭。其間甘苦，已在後記及多篇隨筆中一再談到。

選《說「戾氣」》，因了它是我的有關研究中發表較早、反響較大的一篇。記得寫作的當時，像是憑藉了諸種因緣的湊泊，有一點不吐不快的樣子。這種快感，在我，並不常有。經常的是，孜孜矻矻地「開掘」，寫得辛苦也讓別人讀得累。《時間中的遺民現象》並不曾作為論文發表，因而沒有拘泥論文的寫作規範，近於鋪敘。其實「論文」也者，何不可有此一格？我關於「明清之際」的文字中，較成系統的，是《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》的下編《明遺民研究》。選其中篇幅較少的一章，或許能使人約略看出這項研究的面貌。四篇中《談兵》一篇最儼乎其然，體量也大，寫來很花了功夫。考察「制度」，本非我所

長。當初選這題目，除了因那字面能激發豪情與想像力，也想試試由如此具體的「點」切入，有可能達到怎樣的境界。至少我自己，做到後來，覺得已沒有太多「剩義」——這也是能令我滿意的結果。最後是一篇人物論。回頭想，三十年的「學術生涯」中，持久地吸引着我的，仍然更是人物，無論「歷史生活」中的人物，還是文學作品中的人物。以明清人物為題，傅山之外，另有唐順之；較為得意的，仍然是這篇《我讀傅山》。當時似有所謂的「靈感」來襲，寫來較為痛快，盡興。也如寫《說「戾氣」》，這在我，是稀有的經驗，賴於對象，因而可遇不可求。我指導過的研究生，一個對文字很挑剔的女孩，鄭重地對我說，我的學術作品中，文字最好的，是寫蕭紅與寫傅山的兩篇。我自己未必不這樣認為。

編選這本小書時讀到了平原的《總序》，注意到其中的一大篇關於「學術文體」的議論——或許竟是他操作這套叢書的主要動力的吧。我自以為很能理解這用心。對「怎麼說」，我也一向在意，無論論文還是隨筆，每一篇都或多或少費了經營。寫作所謂的散文，你會認為有必要尋找筆調，寫作學術，卻有可能被「研究對象」、被徵引的文字所誘導。你試圖貼近，無意間沾染了對象的氣息。你對材料的感覺、理解滲透了「表達」層面，儘管你不曾刻意。但我仍然要說，對於學術，「怎麼說」的重要性畢竟不能與「說什麼」

麼」相比。事實上，我怕讀過分漂亮的文字，怕買櫝還珠，或所買的只是「櫝」，其中並無「珠」。

其實從來沒有一致認可的「漂亮」。較之對於美色，「文字感覺」或許更關氣質、性情，不會有「同好」，卻有可能「好」得莫名所以。那或許是你不能與人分享的一份經驗。

無論在寫作的當時處於何種狀態，收在這本小書裡的，都不像是一些讀來能令人愉快的文字，不宜用於消閒，它們或許能吸引你去關注那個時段，那個時段的思想與人物——這也正是我所能期待的。

二〇〇八年五月

說「戾氣」

明代的政治暴虐，已是一個常識性話題，且已獲得某種象喻資格——常常被人因特定情境而提到，如在二十世紀三、四十年代，丁易那本《明代特務政治》，就是當時的諷喻之作。一時的左翼史學家，很少不利用這現成的題材的。我以為，較早而有力地運用了這個象喻的，仍然是魯迅。這是後話。在本文中，我更關心親歷過那時代的士大夫的反應和反應方式，尤其他們對其所處時代的批判及其所達到的深度，以及他們對其所置身其間的時代氛圍——也即他們本人的生存情境的感覺與描述。明代學術雖以「荒陋」為人詬病，明代士人卻不缺乏對自己時代的批判能力，尤其在明清之交，在經歷了劫難的那一代人，在其中的思想家。那一代士人中的優秀者所顯示的認識能力，為此後相當一段時間的士大夫所不能逾越。

我注意到了王夫之對「戾氣」對於士的「躁競」、「氣矜」、「氣激」的反覆批評。以「戾氣」概括明代尤其明末的時代氛圍，有它異常的準確性。而「躁競」等等，則是士人處此時代的普遍姿態，又參與構成着時代氛圍。

我還注意到同處此時代的著名文人，與如王夫之這樣的大儒的經驗的相通：對上文所說「時代氛圍」的感受，以至於救病之方；儘管他們完全可能是經由不同的途徑而在某一點上相遇的。但這決不像是偶爾的邂逅。事實與認識的積累，使得有識之士在不止一個重

大問題上默契、暗合。就本文所論的問題而言，我注意到的，就有錢謙益的有關議論。

錢謙益以其文人的敏感，也一再提到了瀰漫着的戾氣。他在《摹刻大藏方冊圓滿疏》中描述他對於世態人心的體察：「劫末之後，怨懟相尋，拈草樹為刀兵，指骨肉為仇敵，蟲以二口自齧，鳥以兩首相殘……」（《牧齋有學集》卷四一，頁一三九九）他說到普遍的「殺氣」，說「刀途血路」，說毀滅人性的怨毒和仇恨。他另由一時詩文，讀出了那個殘酷時代的時代病。「兵興以來，海內之詩彌盛，要皆角聲多，宮聲寡；陰律多，陽律寡；噍殺悲怒之音多，順成暉緩之音寡。繁聲入破，君子有餘憂焉。」（《施愚山詩集序》，同上書卷一七，頁七六〇）「噍殺」是他常用的字面。以降清者作此詩論（所論且多為遺民詩），你得承認，是需要點勇氣的。由此不也可見錢氏的氣魄？無論開的是何種藥方，錢謙益是明明白白提到了「救世」的。他所欲救的，也正是王夫之顧炎武們認為病勢深重的人性、人心。〔二〕

【一】錢氏在《徐季重詩稿敘》中引師曠語（「南風不競，多死聲」云云），說：「何謂死聲？怨怒哀思，怙懣噍殺之音是也」，其與夏聲皆「生於人心，命乎律呂，而著見於國運之存亡廢興、兵家之勝敗」（《牧齋有學集》卷一八，頁七九六）。在《題紀伯紫詩》中，（下轉第九頁）

一時的有識者對時代氛圍有感受的相通。朱鶴齡說：「今也舉國之人皆若餓豺狼焉，有猛於虎者矣。」（《獲虎說》，《愚庵小集》卷一四，頁六五八）張爾岐《廣戒殺牛文》極言「殺人之慘」，曰：「殺牛之慘，戒懼迫蹙，血肉淋漓而已；殺人之慘，則有戰懼而不暇，迫蹙而無地，血肉淋漓充滿世間而莫測其際者；何也？殺牛者，刀砧而已；殺人者，不止一刀砧也。」說「使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，相率委溝壑而死，即為殺人」。（《蒿庵集》卷三，頁一四四）方以智寫於喪亂中的文字，亦頗有血的意象，如曰「彌天皆血」、「古今皆血」。（參看《浮山文集後編》）王夫之的《蟻鬥賦》（《船山全書》第十五冊）也可讀作有關其時時代空氣、歷史氛圍的寓言。明末劉宗周致書其時首輔溫體仁曰：「乃者囂訟起於纍臣，格鬥出於婦女，官評操於市井，訛言橫於道路，清平世宙，成何法紀，又何問國家擾攘！」（《上溫員嶠相公》，《劉子全書》卷二〇）吳偉業、陳維崧也說戾氣、殺氣，甚至也用「噍殺」的字面，當然也不是偶然的思路相遇。〔一〕

王夫之等所提供的以上描述，並不足以標明深度。由儒家之徒與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人說出上述明顯事實，是不會令人驚訝的。明清之際有識之士的深刻處，更在於他們由此而對明代政治文化、明代士文化的批判，比如對暴政所造成的精神後果的分析。在這方

面，王夫之的有關評論，仍然具有更為犀利的性質。

暴政——對抗

不消說，明末上述民情士風，是整個明代政治的結果。王夫之借諸史論（亦政論）對於暴政的批判，有着無可置疑的針對性。

（上接第七頁）說：「願伯紫少閤之」，「如其流傳歌詠，廣賁焦殺之音，感人而動物，則將如師曠援琴而鼓最悲之音，風雨至而廊瓦飛，平公恐懼，伏於廊屋之間，而晉國有大旱赤地之凶。可不慎乎！可不懼乎！」（同上書卷四七，頁一五四九）但錢氏非全用此一標準，如《題燕市酒人篇》，即有對時調的理解。

【一】吳偉業說戾氣、殺氣，見吳偉業《太倉州學記》、《觀始詩集序》、《扶輪集序》等篇，均見《吳梅村全集》。陳維崧《王阮亭詩集序》說：「勝國盛時，彬彬乎有雅頌之遺焉。五六十年來，先民之比興盡矣，幼渺者調既雜於商角，而亢戾者聲直中夫鞞鐸，淫哇噍殺。彈之而不成聲。夫青絲白馬之禍，豈侯景任約諸人為之乎？抑王褒庾信之徒兆之矣。」（《湖海樓全集》文集卷一）與錢、吳等人思路相接。顧炎武也曾批評「北鄙殺伐之聲」（參看《日知錄》卷三《孔子刪詩》條）。

士所談論的政治暴虐，首先繫於士群體的經驗，也即施之於士的暴政。明太祖的殺戮士人，對於有明二百餘年間「人主」與士的關係，是含意嚴重的象徵。明初的士人，就由此敏感到其生存的極端嚴峻性。蘇伯衡比較了元、明當道的對於士，以為元之於諸生，「取之難，進之難，用之難者，無他，不貴之也。不貴之，以故困折之也」。明之於諸生則不然，「取之易，進之易，用之易者，無他，貴之也。貴之，以故假借之也」。蘇氏不便明言的是，與其「假借之」，不如「困折之」：「夫困折之，則其求之也不全，而責之也不備。假借之，則其求之也必全，而責之也必備。」（《蘇平仲文集》）到明清之交，士人對其命運的表達，已無須如此含蓄。黃宗羲就徑直說明代皇帝對士「奴婢」蓄之，怨憤之情，溢於言表。^{〔一〕}

明代士人對施之於士的暴政，批判在「廠衛」及「廷杖」、「詔獄」上尤為集中。據《明史》刑法志，明代的廷杖之刑自太祖始；到正統時，「殿陛行杖」已「習為故事」。詔獄始於漢武帝，「明錦衣衛獄近之，幽系慘酷，害無甚於此者」。「廷杖」、「詔獄」是士人蒙受恥辱的標記，透露着明代帝王面對士人時的複雜心態，包括隱秘的仇恨。王夫之在其史論中說到廷杖、詔獄之為對臣的污辱（「北寺之獄，殘掠狼藉，廷杖之辱，號呼市朝」），以之為「為人君者毀裂綱常之大惡」。^{〔二〕}王氏更關心三代以下對於士的戮辱

的後果：「身為士大夫，俄加諸膝，俄墜諸淵，習於訶斥。歷於桎梏，褫衣以受隸校之凌踐」，隱忍偷生，又怎能指望他們「上憂君國之休戚，下畏小民之怨讟」（《讀通鑒論》卷二，頁一〇六）呢！王夫之無疑以為瀾漫天下的「戾氣」，正由君主所激成。（參看《讀通鑒論》卷二四）【三】

【一】參看《明夷待訪錄·奄宦上》，《黃宗羲全集》第一冊。黃宗羲還借閹發師說（按師即劉宗周）曰：「顧後來元明之開創者，不可稱不嗜殺人，而天下為威勢所劫，亦就於一，與秦隋無異……蓋至此天道一變矣……」然後世君驕臣諂，習而成故，大略視臣如犬馬，視君如國人者，居其七八。顧亦有視之如土芥，而視君如腹心者，君子多處於是，如黃石齋、成元升之類；……」（《孟子師說》卷一、卷四，同上書頁五一、一〇五。黃石齋，黃道周；成元升，成德）

【二】《讀通鑒論》卷三〇，頁一一三七，《船山全書》第一〇冊。祁彪佳也說過：「蓋當血濺玉階，肉飛金陛，班行削色，氣短神搖。即恤錄隨頌，已魂驚骨削矣。」語見《明季南略》卷二，頁七九。

【三】同卷王氏說：「習氣之薰蒸，天地之和氣銷鏹無餘。推原禍始，其咎將誰歸邪？習氣之所由成，人君之刑賞為之也」（頁九二九）。萬斯同《讀洪武實錄》也說明太祖「殺戮之慘一何甚也」，「蓋自暴秦以後所絕無而僅有者」（《石園文集》卷五）。孟森說崇禎「茫無主宰。而好作聰明。果於誅殺」（《明本兵梁廷棟請斬袁崇煥原疏附跋》，《明清史論著集刊》頁二七）。錢穆《晚學盲言》四一《帝王與士人》：「在中國歷史上，開國之君與其同時之士最疏隔者，在前為漢高祖，在後為明太祖。而明太祖尤甚」。